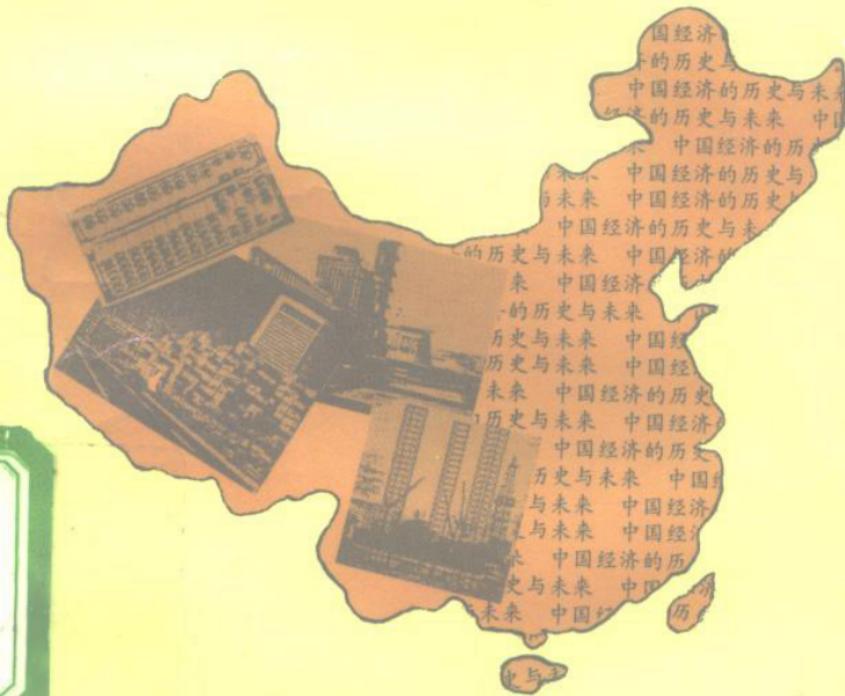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历史与未来

建国以来 十大经济热点

杨 江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

杨 江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079号

责任编辑：杨 岗电话(8319291)

封面设计：侯 明

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

杨 江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渤海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5.25印张 92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10000

ISBN 7-5017-3216-7/F·2304

定价：8.00元

目 录

1. 呈花一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1)
1.1 开国何茫然：一穷二白路在何方…	(1)
1.2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兴盛.....	(6)
1.3 历史说：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13)
2. 难忘的一九五八.....	(19)
2.1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19)
2.2 “大跃进”面面观.....	(24)
2.3 “学而不思则罔”.....	(32)
3. 十年“文革”，十年沧桑.....	(33)
3.1 重考“文革”之源.....	(33)
3.2 世说新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37)
3.3 还未完结的课题；经济与文化.....	(44)
4. 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包产到户.....	(49)
4.1 田园将芜，胡不“包”	(49)
4.2 饥饿中的选择.....	(56)
4.3 思绪万种，怎一个“包”字了得！ …	(61)
5. 新“围城”记：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67)

5.1	用计划编织起来的城市经济	(68)
5.2	“父子”分而不离，“诸侯”分灶吃饭	(73)
5.3	驶入叉道的双轨列车	(77)
5.4	面壁十年图破壁	(80)
6.	新重商主义：十亿人民九亿商	(83)
6.1	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第三次浪潮”	(84)
6.2	高潮冲击下的中国	(91)
7.	股市风云录	(99)
7.1	从“红军股票”到“北京天桥”	(100)
7.2	躲在深闺人未识，回眸一笑百媚生	(104)
7.3	股海无边，何处是岸？	(108)
8.	九十年代的“土地革命”	(116)
8.1	现代图腾：土地是财富之母	(117)
8.2	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	(121)
8.3	拓展21世纪的空间	(125)
9.	变革中的“裂变”：中国的双重二元	
	社会经济结构	(131)
9.1	中国的根本国情：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132)
9.2	最大的失衡：地区经济结构二元化	(136)
9.3	反“马太效应”：走向共同富裕	(140)
10.	古老的新生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45)
10.1	千呼万唤始出来	(146)
10.2	换一个脑筋，换一种活法	(150)

10.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入“市”而
求索..... (154)

1. 昙花一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任何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人们的回想中总是那么辉煌、壮丽。但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呈现出来的历史底蕴则更为丰富和激动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短短几年，向人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部意味无穷的历史篇章。

1.1 开国何茫然：一穷二白路在何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是那么年轻和充满了希望。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又是那样的脆弱。1949年的统计报表反映出的全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农业总产值326亿元（以上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62亿斤；棉花：44.4万吨；油料：256.4万吨；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度；水泥：66万吨。全年财政收入304亿斤粮，支出567亿斤粮，赤字264亿斤粮。这就是共和国的家底。除了贫穷以外，年

轻的共和国还面临着一系列更为严峻的挑战。

连续12年的战争，国民经济已是千疮百孔，濒临崩溃。农村耕畜比战前减少17%，主要农具、肥料减少30%；工矿设备被破坏、运走，留下的残破不堪；交通运输能力的破坏更为触目惊心，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严重破坏，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线路，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能通车的不到原有线路总长的80%，海运可航驶的轮船总吨位为14.5万吨。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仅及战前最高水平的42.7%。

战祸之后又逢天灾。1949年水灾严重，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灾民约4,000余万人。其中重灾区占2,800万亩，约有700万灾民急待救济。天灾尚不足惧，由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和疯狂的投机所造成的人祸则更为严重。1949年1月、4月、7月、11月先后刮起了四次涨价风潮。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1月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到5,376。与此相伴的是，各地投机资本乘风作浪，牟取暴利。如北京、天津等地的投机商利用华北地区春旱，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上海投机商则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推波助澜，扩大涨势。继而，上海的投机商又操纵金融市场，大肆进行银元投机。当时，上海的金融投机者有十多万人，银元的黑市价

从1,400元涨到2,000多元。人民政府在一天之中投下了一万银元以平抑市场，但如杯水车薪，银元价格一点也没有回落。

人民共和国刚诞生就面对如此严峻和迷茫的局面，难怪人们会发出“共产党在马上取天下，能否在马上治天下？”的疑问。这一历史难题不仅意味着能否迅速治理战后的经济混乱和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更关键的在于能否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现代化经济的道路。所幸的是，共产党人中不乏高明的战略家。他们没有被战后的混乱和暂时的困难所迷惑，而是运筹帷幄，高屋建瓴，明智地确立了建国之初的基本国策。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毛泽东一语定乾坤，名正则言顺，新民主主义经济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由此而确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进一步地提出和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构想。其基本要点是：第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10%左右，而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第二，中国的现代性工业所占的

比重虽然很小，但它却是极为集中的最大的资本。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第三，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第四，对于大量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国家政权管理下的集体经济组织；第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治政策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治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第六，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而这一形态的结束，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多次估计大约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

紧接着另一部纲领性文件的颁布，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想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提出了以下具体的经济政策：1. 经济建设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国家应在经营原则、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

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2.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必要的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3.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4.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

倘若我们把年代的特征抹去，这些纲领、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天的人们的眼中并不陌生。这样明智和从容的抉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国情，摒弃空想。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没有立即提出搞社会主义。对此，薄一波同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这种真心实意来

基于对中国国情深刻的理解，而非权宜之计。基于此，我们认识到，在我国推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根基和社会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容纳百川，协调四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这方面，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还占着较大比重，“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而且，不能过早地消灭它，“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但是，“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这些话，在今天的人们读来，恐怕会对其惊人的历史预见性感叹不已。而在当时，唯有审时度势者，才有此远见卓识；也唯有雍容大度的政党，才能融百川而成大海。此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迅速兴盛，皆有赖于此。

1.2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兴盛

治国方略既定，中国共产党以其惯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从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转向经济战场，展开了一系列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平抑物价，整肃秩序

物价暴涨，人心不定，天下无以为安，经济建设更无从谈起。为此，当时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发出了《制止物价猛涨》的通知，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物价暴涨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将物价上涨最严重的津沪两地的物价平均指数控制在两倍以内，人民银行停止一切贷款。同时，各大城市开始征收有利于收缩银根的税种；各类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的以外，一律暂停支付，各地国营贸易公司，也暂不将主要物资抛售；对于投机商人，在抢购风盛时，将冷、呆货抛给他们，但不抛主要物资，待银根收紧，物价稳定后，投机商吐出主要物资时，则乘机购进。

在这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指导下，各大城市加强了金融与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活动，法办违法分子，集中抛售物资、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门，公家的钱只准存放在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一“收”，行政和经济手段双管齐下，到年底时就基本稳住了物价，使财政收支从大量赤字转为基本平衡，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的局面。

——统一财经，调整工商

全国解放后，国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了，但经济还是一盘散沙。地方各自为政，自收自支。而当时的军政公教人员约900万，都是吃“皇粮”，由中央财政负担。收在下面，支在上面，收支脱节，中央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只有靠印钞票过日

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由于1949年平抑物价、紧缩银根，到1950年春夏之交时，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经济萧条，百业不兴，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许多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工人大量失业等现象。以上海市为例：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交易量，与同年1月份相比，分别下降了83%和47%，到4月下旬，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失业的工人达20万人以上。全国的状况与上海大同小异。因此，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恢复发展迫在眉睫。当时，中央对这两件事十分重视。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同志评价说：“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十条决定。在中财委的主持下，坚定地实施了以下措施：在收入方面，规定公粮、税收、库存物资和国营企业的利润一律收归国库，由中央掌握；在支出方面，规定统一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不准擅自招收新人员，额外开支。此外，还规定国营贸易的资金和物资的调用统一于中央贸易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现金除留下近期使用的额度，一律存入国家银行。至此，以统收统支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型初步形成。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方面，从1950年夏季开始，采取

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①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②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③在原料和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④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零售商业只经营粮食、煤炭、油品、布匹和生产工具等少数重要物资，掌握货源的1/3到1/2。其他商品则让给私人经营，并促使他们以适当价格收购和运销农产品；⑤调整零售价格，使私商有利可图；⑥适当减轻税负，简化征税手续。经过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理顺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济情况明显好转，私营工商业纷纷重新开业，市场日益活跃，国家税收也明显增加，为今后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深化土改，发展农业

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以粮安天下，到目前为止这句话仍未失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根本的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展的土地改革，成效卓著。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广大农村土改运动全面铺开。1950年秋，华东和中南地区的1亿多农业人口的300多个县进行了土改，其余1.6亿农业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南、中南地区）分别

-于1951年和1952年完成。加上已进行了土改的老区，到1952年底，土改运动胜利结束。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些典型特征：如采取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对富农经济实行保护；对小土地出租者出租的土地，也不予征收；对地主，除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房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城郊土改后没收的土地，一律收归国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

土改的顺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8,000多万亩；制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保证农民利益；积极组织和发放农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良种，改进耕作质量。因此，这段时期的农业飞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产量达到了3,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42.8%。其它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农业的迅速恢复，对于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所提供的资源、劳动力和积累资金。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奠定的农业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期迅速发展打下了第一块牢固的基石。

——自力更生，振兴工业

农村稳定后，经济建设的重点自然转向城市里的工业。这一时期，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把一个破碎不堪的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取得了比农业还显著的成绩。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343.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144.9%。各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提高。钢产量达134.9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753.8%；原煤产量达6,649万吨，增长105%；发电量为72.6亿度，增长了68.4%；原油产量达43.6万吨，增长了260.3%；水泥产量达286万吨，增长了333.3%。同时，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原来只能搞一点修配的机械行业，已可制造成套的纺织机械、多种工作母机、矿山设备和3,000千瓦发电机等；钢铁企业也已能生产多种普通钢板、钢材和无缝钢管。还能轧制钢轨，此间修建的成渝铁路，就全部使用的是我国自己生产的钢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三年中聚集了大量的资金投入重点建设。花了7亿元搞水利工程，全国4.2万公里堤防全部进行了整修，根治淮河工程开工，于1951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修建了现代化的灌溉工程358处；投入了17.7亿元用于交通运输建设，原有铁路线全部得以修复和改善，投资修建了三条新线（即成渝线、米铲线和天兰线）。新建公路3,864公里，主要分布在交通不发达地区，新建的塘沽港也于1952年10月正